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New Banner

# 新旗

第五十期

實售國幣一千元

## 延安失守以後

劉默

延安失守已經相當久了，但由此可以看出的意義却還不是明日黃花。

國民黨會想借此題目大做文章，企圖在國內國外造成一種印象，彷彿共軍不堪一擊，內戰勢將結束，因之國軍很快就靠軍事解決，國民黨這為衆所棄與失盡人心的統治，將長此無事，可以延至億萬千年了。

其實，稍知事理與略具常識的人都不會相信這種輕浮的樂觀，因之，無論國內國外，都不會對這種宣傳加以注意。國民黨政府宣傳部的特別公報，參謀總長的快意演說，都不會激動了人心。人們把他當成一件不重要的新聞，淡淡看過，輕易地忘懷了。這原是理當的。內戰的長期化是一個註定了的事實，延安的得失在軍事上說來是完全談不上什麼決定意義的。

但是完全沒有意義嗎？那也不。中國的史大林主義者慣把每一失敗說成爲勝利，把城市的失陷喻之爲『拋棄了笨重的包袱』，那是有點近乎解嘲，有點聊以慰情的。延安失守縱然在內戰的軍事意義上不大，但是在政治的意義上，在革命政策的意義上，却是頗爲重大的。

我們這話並非指：中共的首都失陷所予一般人的政治上的與心理上的影響；不，我們所說的政治意義，主要是指延安失守所反映出來的中共所採取的政治路綫。我們必須趁這機會把這個路綫的錯誤再度指點出來。

自從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在大城市中失敗以後，革命餘波推廣到鄉村，激起了中國規模極大的農民暴動，中共便遺棄了工人階級，把全力

移轉到鄉村中，把共產黨的基礎改築在農民身上。他們認爲：光靠農民的力量可以造成『紅軍』與組織『蘇維埃』。那時候，托派，即中國共產黨的左派反對派，立即指出了這個錯誤，認爲：祇有在城市無產階級再興的革命鬥爭的政治領導之下，這些農民的武裝隊才有前途；否則，牠或者將被優勢的國民黨武力所消滅，或者將屈服於鄉村與城市的資產階級及其政黨之前。結果，如衆所周知，中共對國民黨屈服了，同時放棄了一切階級鬥爭的路綫，執行了對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妥協政策。以此代價，又靠了日帝的侵略，中共纔算保持了牠的武力與地區。

戰爭完結了。『得了勝』的資產階級依靠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力量，企圖根本剷除中共這個勢力；

### 第十五期目錄

延安失守以後……	劉默
從動工大樓血案得來的教訓……	舒振
生活指數凍凍與罷工權……	振聲
『抗暴』與『護權』……	木君
我們應當怎樣看台灣事件？……	穆德
中國四大家族（書評）……	唐盛
國際鬥爭	
動盪中的西班牙……	盛盛
西歐諸國罷工……	盛盛
東方也有罷工潮……	盛盛
對於越南屠殺的抗議……	盛盛
美國托派統一組織……	盛盛
讀者通信	
繼續維持我們的新旗……	陳康成
甚麼是機會主義？……	唐中流

中國革命悲劇（續）

唐盛 譯者  
Harold R. Isaacs

發行者  
通訊處

新旗社  
香港西灣河太古船塢李振聲

因爲，不管這勢力如何放棄階級鬥爭路綫，如何對國民黨妥協；但由於傳統，國際關係，乃至部分的改良政策，以及獨樹一個系統的軍隊，却仍舊與國民黨不能共存的。國民黨決心要消滅這個力量。這時候，如果中國共產黨（史大林主義者）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她一定要走上不妥協的革命的路，站在國家當前幾個迫切的問題上，有如：民族獨立，土地革命，工人監督與管理生產（尤其是敵僞工廠），徹底改善工人及職工痛苦，以及召開全權普選國民大會，建立工農政府等口號，以便發動階級的革命鬥爭，尤其在城市中，重新團結與組織無產階級，走上他們積極反對國民黨的政治鬥爭的道路；在鄉村中，則徹底實行土地歸貧農，土地歸兵士，藉以瓦解國民黨的軍隊。

中國史大林黨不這樣做。她企圖和國民黨爭奪『民族資產階級』的同情，企圖爭得美國帝國主義的『中立』，宣佈自己是『發展資本主義的黨』，提倡勞資合作，鄉村中繼續以改良爲限，在政治上則提出『聯合政府』，派自己的領袖去和國民黨作無原則的妥協與無結果的和談，以致最後，等到美帝和蔣介石的內戰準備就緒之後，被逼於劣勢中倉卒應戰，以不徹底的土地改革企圖買得農民大眾的支持。

日帝投降到現在快一年有半。這期間曾經給了中國共產黨以最好機會，使牠重新回到城市中來，或更正確些，使牠的基礎擴大到工人中來。但是，爲了國民黨的『和談』，爲了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同情』，中共不敢在城市中領導階級鬥爭，以致白白地放過了機會。共產黨的階級合作，幫助了國民黨工運特務之重新控制各大城市的工人階級。

沒有城市工人階級的革命政治鬥爭，這便規定了中共的戰爭機構在內戰中的規模與力量。牠不能

不自限於農民的遊擊戰性質，牠不能占領與保持城市據點，牠不能對國民黨軍隊獲得決定性的勝利，甚至牠不能不逐漸縮小其區域，將來，如果戰爭十分延長，也許祇能保持與蘇聯或外蒙直接毗連的地方。

延安，以及較早的張家口與淮陰等地的失守，首先都應該從這一個政治的意義觀察的。每一個真誠的共產主義者，每一個工人革命家，每一個關心於中國內戰的人，都應該從延安的失守而重新考慮中國史大林黨的政略與戰略的。現在內戰已臨到嚴重關頭了；由美國帝國主義政策與莫斯科會議的情形看來，中國這個內戰將是長期的與無出路的。國民黨要根本消滅中共所領導的武力果然是幻想；但中共方面的農民軍隊之行動遭受愈來愈大的壓迫，將經歷着愈來愈大的困難，却是一定的。爲要保護這支受鎮壓的農民軍隊，更爲要使牠能真正地轉敗爲勝，并從而走上勝利的革命之路，那末，城市工人階級的力量能起決定作用的，一切消極等待與唯一期望農民軍勝利來解決種種政治問題的人，於延安的失守該有一番新的覺悟了。

## 從勸工大樓血案得來

### 的教訓

舒 嚴

本刊上期出版後即發生勸工大樓血案，當時報紙雜誌寫了許多抗議和哀悼的文章，三月份本刊因故不能出版，以致來不及參加抗議和哀悼，現在四月份本刊出版時輿論界已沒有人提起這件血案了。此時我們再來爲血案說幾句話，似乎是多餘的。

可是我們還是要說幾句話，因爲這幾句話是一切抗議和哀悼的文章中未曾說過，而這又是一些頗重要的話。

梁仁達烈士預定出殯前一日，吳國楨市長下令禁止出殯，爲了害怕出殯時雙方會發生衝突；因爲，據他說，治喪委員會雖能動員五萬學生和店員，但總工會也能動員十萬工人。當時『文匯報』會從這幾句有名的話做出結論，來證明梁仁達究竟是誰打死的。可是『文匯報』及其他刊物都未曾注意到吳國楨這裏是把工人和學生（及店員）對立起來，更未曾從這對立做出甚麼結論。

不錯，我們應當說，在勸工大樓血案中並沒有工人和學生的對立，『總工會』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那天即使出殯，至多祇能動員幾百個或幾千個『護工隊』罷了，決不能動員十萬工人。這一切都不錯，但是吳國楨說話中爲什麼能把工人和學生對立起來呢？兇手們爲什麼能造成一種印象，彷彿站在治喪委員會一邊的，即站在民主一邊的，是學生和百貨業店員，而站在敵對一邊的，即站在反民主一邊的，則是各工廠各產業的工人呢？

因爲，直至現在爲止，各工廠各產業的工人羣衆，雖然不是站在反民主一邊，也不會站在反民主一邊，但他們也還未曾站在民主一邊，他們尙未曾表示其政治意見。工人羣衆自從上次革命失敗，退出中國政治舞台以後，至今尙未重新踏入政治舞台。舞台上留下這個空隙，所以反民主派才能穿上工人衣服，扮演工人腳色。

中國工人未能在政治上發言，主要當然是爲了那些反民主派壓迫得太厲害。抗戰勝利以後，學生及一般小資產階級固然也是受壓迫的，但比起工人來，還有相當的自由，還能出版刊物，開羣衆大會，遊行示威，張貼標語，叫喊口號。至於工人，則完全沒有這些政治權利了。工人可以提出經濟要求，可以用罷工手段達到經濟要求，人們大體上也允許工人照生活指數計算工資，雖然市政府製造的生

活指數本身就有問題。可是工人不能提出政治要求，不能在政治上有所表示。社會局，總工會，特務機關，那些工運專家，那些工人『領袖』，有時抵不過羣衆壓力，也會以偽善的方式去幫助工人經濟鬥爭的，但絕對禁止工人政治鬥爭。他們幫助工人經濟鬥爭，其目的正是爲了更能控制工人，更能阻止民主派和革命者到工人羣衆中來領導工人作政治鬥爭呀！反民主派明白，祇要城市工人在政治上沉默，則無論其他階級如何叫囂，甚至內戰，他們仍可高枕無憂的。在如此壓迫之下，工人羣衆沒有政治發言，難道有甚麼奇怪麼？

可是，這裏，民主派是否全無責任呢？這就是我們要說的話。民主派，恰恰與反民主派相反，並不認識工人羣衆底力量，并不明白：若無城市工人參加而且領導，則他們追求的民主是永無實現之日的。某某民主派刊物公然說建國的兩根支柱是農民和學生，公然在封面上畫着拿鐵刀的農民和拿自來水筆的學生攜手前進。他們頭腦中根本沒有工人位置。勝利之後，人們把工人運動交付於朱學範領導的勞動協會，祇限於替勞動協會做點下層工作。勝利之後，人們忘記了替工人提出切身利益和要求。請問從收復失土以來這一年半當中，民主運動替工人提出了什麼要求呢？給予了工人什麼利益呢？即以勸工大樓血案而論，『愛用國貨』『抵制美貨』，除了說中國資本家發財，工人生活也能好些以外，還有什麼好處給工人麼？某某民主派刊物甚至公然反對增加工人工資。

這一年半的民主運動，僅在學生圈子內打轉，至多到了文化較高生活較好的職員和百貨等從業員，而未能深入工人羣衆中去，——可見民主派本身也是不能辭其咎的。

怪工人站在反民主一邊，與學生和店員對立起

來，——這話自然是胡說。但若怪工人沉默，不積極起來參加民主運動，——那是民主派自己應當首先反省的。

我們向梁仁達烈士及那日被毆受傷諸君致敬。我們站在他們一邊，向一切反民主勢力作戰。但是我們希望他們經過此次教訓能够覺悟：民主運動如果深入工人羣衆中去，是沒有力量的，但要深入工人羣衆，則比民主運動首先就應當提出工人利益和要求。工人參加了和領導了民主運動，一切反民主派就無從假借工人名義，造成工人和學生對立之印象了。

## 生活指數解凍與罷

### 工權

振聲

上海以及另一些大都市的工人階級，戰後得到了一個不小勝利，那便是按生活指數發給工資。雖然這辦法在實行中有許多缺點，尤其是生活指數之編製權完全操在市政府手裏，讓少數人閉門瞎造，以致指數和物價的真實上漲脫節甚遠，使這勝利不能收得實在利益。但在物價顯然狂跳與漫無止境的通貨膨脹之下，雖然是偽造的生活指數，也總於工人階級有利。因為牠總不能完全不變，總得逐月加添一點。因此，在內戰引起的經濟總崩潰之前，首先遭殃的便是按生活指數發給工資的辦法。

這原是十分自然的，代表資產階級的政府，爲了解決經濟危機，祇能將全部負擔，完全壓在工人階級與薪水階級的肩上。國民黨統治者從我們全體勞動者身上，從我們最低限度的衣、食、住的費用中，取去了一大部分，使我們陷在凍餒地步，祇爲的要維持一切戰爭的經濟機構，以便繼續內戰，討伐由中共領導的農民軍隊。

因此，生活指數凍結的意思不僅指的是我們工人遭殃，又表示着農民受難。同時，我們要求生活指數解凍，不但爲了我們自己的生存，也爲了快些結束這個內戰，爲了幫助幾百萬正在進行武裝鬥爭的農民。

我們必須要求生活指數解凍，更必須要求由工人與職員直接推派代表，組織委員會，藉以編製生活指數，或至少監視生活指數的編製。

如何要求呢？自然有許多辦法，不過最後說來，要使一切要求方法成爲有效，則唯有靠罷工這個武器。國民黨統治者很明白這一點，所以牠在凍結指數同時，又禁絕了罷工。我們必須爲罷工權的獲得與保持而鬥爭。

其實國民黨自從控制了政權以來，從未正式承認過工人享有罷工權利；至少在事實上，罷工始終被視作『犯罪』或『搗亂』行爲的。而工人們則始終不管國民黨政府的法律而實行罷工。我們這次也不必顧管那個無理的『經濟緊急措施』的法令。我們應該根據這個爲一切真正民主國家所允許的民主權利，即罷工權利，實行自衛，要求取消一切對生活指數所加的限制。

但是這一直接打擊工人生活的反動措施，爲什麼沒有引起工人階級的普遍反抗呢？爲什麼沒有促成新的罷工潮呢？這就不得不歸功於國民黨工會官僚與工運特務的力量了。

日帝投降後蓬勃起來的上海的罷工運動，使三十萬產業工人組織進了工會，使這些工會握在一些積極的工人領袖與改良派（勞協）工會官僚之手。是這些新生的工會，領導了一九四五年後半期與一九四六上半期的上海以及各大城市的工人運動；同時也是這些工會，替工人階級與一般的薪給者爭到了某些生活保障，其中重要保障之一，便是按照

生活指數發給工資薪水。

國民黨，資產階級，甚至『民主』的『民族資產階級』，都在這個運動之前發抖了。他們首先在輿論上造成了進攻的基礎，說『中國工人的工資比美國工人的高』；說『這樣高的工資將摧毀中國的民族工業』，以及諸如此類的鬼話。然後，他們在組織上下手；收買工會官僚，收買不成則打擊之；排斥稍稍傾向於改良的朱學範的勞動協會，逮捕其人員，接收其機關，終於完全侵占這組織；對於純粹由工人產生的積極份子，國民黨統治者始則強迫全體入黨，繼則強迫集中受訓，最後，對於那些最堅持的份子，則公然採取綁架手段。如此，國民黨統治者用盡一切方法，自去年七月開始，逐漸把戰後新生的羣衆的與戰鬥的工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上了。

於是上海工人階級又生活在無組織無領導以及無保障的恐怖中了。他們不得不把剛剛抬起來的頭重新低下去，忍受國民黨資產階級加於他們身上的一切壓迫，一切剝削，一切無理的法令，最後，連他們的最後保障——生活指數，及他們的最大武器——罷工權利，都讓人家公取去而不敢作一聲。

我們必須從這樣的屈辱與無告的狀態中出來。為此，我們首先必須相信自己的力量。我們應該知道：統治者的反動勢力彷彿是無孔不入，無大不大的，但祇叫我們自己能够團結，那末在我們的聯合鬥爭的壓力下，這種工運特務們的本領是完全顯不出來的。所以第一件事，我們工友們要認清楚目前各個工會中的官僚們的面目，絲毫不要相信他們能有片刻會保護工人利益的，我們應該堅決主張工會民主化，工會理事由工人自由選舉；第二件事，我們要堅決反對強迫工人入『黨』，反對強迫工人『受訓』，反對強迫工人加入『護工隊』；第三件事

，我們要主張工人自己組織委員會，請專家幫忙，逐月編製生活指數，要求廠方依照指數發工錢；第四件事，如果廠方拒絕，我們可以罷工；如果國民黨警政特務機關出來干涉，壓迫罷工，我們要為罷工權而鬥爭到底。

## 『抗暴』與『護權』 木君

有許多人把中國的政治看得太簡單。一切歸結於美蘇衝突。凡反美的必為蘇聯與中共所支持；凡反蘇的必為美國與國民黨所支持。這看法在『最後分析』中也許不錯，但把一切事都如此還原，如此對稱，那就是錯誤的。美蘇衝突在中國政治中固然是一有力因素，但不要忘记：中國本身有階級鬥爭，這鬥爭也很有力地反映於種種政治之上。

把一切還原到美蘇衝突，因而讓自己置身事外，或保持中立者，絕不是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所應採取的態度。因為即使退一步說，目前表現於中國政治生活中的無非是美蘇衝突，那我們也絕無理由『中立』，因為蘇聯無論怎樣墮落，總還不是與美國一樣的資本主義的或帝國主義的。何況我們不能如此『簡單化』呢？

四個月來，中國的學生界中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因北平強姦案所引起的『抗暴』運動，另一件是因莫洛托夫要求在莫斯科討論中國問題所引起的所謂『護權』運動。有些人把這二者放在一個平面上，因為據說第一，這是美蘇衝突的反映；第二，『客觀上多少反映了民族獨立自主的要求。』

這種態度是荒謬的。

第一點理由我們在上面說過了，不成立。第二點理由，那簡直是最鄙陋與最天真的民族主義者的謬語。中國的民族獨立自主自然是好的，我們也要

求，也要為牠鬥爭。但若以為凡是戴着這面具，蒙着這幌子的一切運動都有『客觀進步意義』，因而都至少有部分值得『同情』或『擁護』的地方。那簡直是反動的胡說！

『抗暴』運動是進步的。二年來美國在中國的所行所為，華爾街奴役中國的赤露企圖，很自然地激起了這個運動。『客觀上』，這運動固然幫助了蘇聯與中共，但連華爾街與南京的發言人都不敢說他是受某一特殊勢力所操縱的。事實表現得十分明顯，牠是一次自發的，包括了廣大羣衆的反帝反國民黨運動。

『護權』運動完全不能與此相提並論。無論就性質，規模，尤其就明顯的政治作用說，都是統治黨派有意挑起，以便反對蘇聯，中共乃至一切進步與民主勢力的陰謀。這個反動作用太顯明了，以致在中國的一般學生羣衆中竟得不到什麼響應。結果祇讓極少數的特種學生乾叫幾聲，自己也不好意思地收場了。

所以對這兩種運動，我們的態度十分清楚，而且也容易弄得清楚的：我們擁護與參加『抗暴』，我們反對與揭穿所謂『護權』。

自然，我們與參加在『抗暴』中的中國的史大林主義者不同，我們並不贊成克爾靈宮官僚們在中國恢復的『沙皇特權』，我們也反對蘇聯在中國所會實行與可能實行的某些罪惡政策；但是我們的贊成與反對，完全是爲了中國以及蘇聯的革命利益，絕不是爲了目前由國民黨所『客觀』代表着的什麼『民族』利益。我們是獨立地站在中國與蘇聯的無產階級地位上，反對史大林官僚在中國所實行的與所會實行的短視的擴張政策與搶劫政策，因此，我們絕對不跟在國民黨反動家的尾巴後面，乾喊什麼『護權』——不但有限，而且要積極地反對。

# 我們應當怎樣看台灣事件？

穆德

二月二十八日發生的台灣事件，至今已有一個多月了；事件底經過，報紙已經記載得很詳細了；事件底意義，估計的人也很多，與台灣民眾站在敵對地位的人乾脆把事件說做是共產黨和暴徒底煽亂，這種看法之不合事實，盡人皆知，無需我們駁斥，但同情台灣民眾的人對於事件的看法並非都是正確的，就公開發表的意見來說，則正確瞭解事變意義的人並不多。最流行的意見，認為這是台灣民眾反對國民黨統治的一種運動，同大陸上各地方和平的或武裝的運動差不多。

這種看法太籠統了，籠統到使我們不能從此事件做出必需的結論和得到應有的教訓。必須更具體地指出台灣事件含有的為大陸上運動所未有的意義。

首先，我們應當把台灣人民底反抗看做殖民地反帝國主義運動，把現在尚在進行的殘酷迫害看做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迫害。台灣和中國的關係是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台灣的鬥爭，應當看做同印尼，越南，緬甸，菲律賓等地正在進行的鬥爭一樣的。

說台灣是殖民地，——那是毫無疑問的。甲午戰敗後，中國把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用帝國主義手段把台灣當作殖民地統治了五十年。在這五十年當中，日本也許有人認為台灣不是殖民地，但中國決沒有一個人不認為台灣是日本殖民地的。問題僅僅在於日本投降，台灣回到祖國懷抱以後，對於祖國來說，這是殖民地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看台灣本身是否脫離了殖民地地位。

可是我們看見祖國從日本帝國主義手裏接收台灣時候，不僅接收了這塊失土，而且接收了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手段。總督簡單換名為「行政長官」，總督府簡單換名為「行政長官公署」，一切獨佔，專賣，剝削，壓迫手段，都由行政長官從日本總督接收過來了。換一句話說，過去台灣人在日本手下怎樣過日子，現在在祖國手下也是怎樣過日子。

台灣人能像從前那樣過日子，還算好哩。事實上，現在的生活還不如從前。『過去日本統治台灣，完全做到「原料台灣，成品日本」的原則。每次由台灣開到日本的輪船，如果有兩萬噸原料，則由日本開向台灣的成品，至少有一

萬八千噸。這樣，台灣雖被深刻的殖民地化，但同胞們並沒有感到匱乏之虞。我們接收以後，每次由台灣載回內地兩萬噸物品，載給台灣的却不足五千噸。』（見『文匯報』記者王坪寫的『台灣事件內幕』）『綜觀長官公署的那一套作法，完全是十八世紀時治理殖民地的一套方法，他們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的衣鉢，却沒有學到日本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的乖巧的處理。』（見『文匯報』座談會徐子蓉底發言）不僅在經濟上不會乖巧處理哩，而且在政治上帶來貪污和無能。上層人物貪污不用說，連一個下層兵士也要以低價強買台灣人底東西，這是過去日本兵所不做的。台灣人現在仍在過殖民地生活，是沒有疑問的了。

一個殖民地，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前後是一樣的，甚至後不如前的，牠會祇因變換主人，祇因新的主人是以前的祖國，或與自己同屬於一個民族，而忽然成為非殖民地了麼？一般靠『種族』『血統』『祖國』等抽象觀點來判別殖民地的人，自然要認為台灣現在不是殖民地。但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判斷這個問題，是甯願從更切實的更具體的觀點出發的，是以真名稱呼實物的，我們決不能說：現在，對於祖國說來，台灣不是殖民地。

對於中國說來，台灣固是殖民地，但對於台灣說來，中國是帝國主義國家麼？一般說來，中國能稱為帝國主義國家麼？——說到此處時必然會提出這個問題。人們所以沒有把台灣鬥爭，與印尼，越南，緬甸，菲律賓等地的鬥爭一例看待的，主要就是為了這個問題。

中國是受人壓迫的國家，但在自己國內又壓迫弱小的民族。久遠的且不要說；與台灣事件同時進行的，我們看見大漢族英雄們正在西康剿殺夷人，正在新疆與維吾兒人和哈薩克人武裝衝突，正在長城外邊拒絕給予蒙古人以政治權利。弱小民族問題，在中國並不是新的問題。海通以前，漢族一面受滿族統治，一面向西北和西南諸弱小民族扮出主人面孔。海通以後，帝國主義以中國為殖民地，但這並不能阻止大漢族英雄們更加努力去壓迫弱小民族。凡以為被壓迫者就不會壓迫別人，——這對於一個個人來說是不正確的，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也是不正確的。但是中國對於境內弱小民族的壓迫是否可稱為『帝國主義的壓迫呢？不錯，這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大漢族對於滿蒙回藏苗諸民族，現在

即使不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至少也是「古典的」，「封建的」或本義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可是對於台灣說來，則是名副其實的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第一，因為日本對於台灣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而中國繼承日本底衣鉢，所以也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這一點是容易明白的。第二，因為中國已經發展到以四大銀行和四大家族寡頭政治為代表的金融資本，現在正是這個金融資本侵入台灣，代替日本位置而操縱全島底經濟命脈。「政府在台灣經濟設施，是和國內現行的經濟政策相一致的，是以官僚資本的利益為出發點——隨着政府底到來，官僚資本立刻站在省營國營底招牌後開始活動，中國四大家族底資本也開始侵入並且佔據了相當的地盤。隸屬於長官公署工礦處的許多公司把台灣的大小工廠，除了四大家族控制下的大工廠和一些民營的小工廠外，全部佔據了。屬於農林處的公司則把台灣底水產，林業以及農業底大部分生產機構控制了。交通處則包辦了全省底交通和運輸。國省合營的台糖公司不僅包辦了台糖底生產配銷，並且直接地控制了上海市場底糖價。在全國各省中，官僚資本底活動恐怕以台灣為最徹底了。可是由於四大家和其他官僚資本集團的內在矛盾，在台灣經濟上分贓的不平均，台底一些大公司底情形是很特殊的。最近為了消滅他們自己的衝突和順利遂行他們的剝削計劃，省營的公司都依性質合併為工礦公司，農林公司以及交通公司，容納一部分四大家族資本，於是官僚資本在台灣活動的步伐就一致了。」（見「文匯報」記者并容寫的「台灣事件底前因後果」）這段話很清楚說明了中國對於台灣的經濟控制。「在全國各省中，官僚資本底活動恐怕以台灣為最徹底了。」所謂「官僚資本」其實就是陳伯達說的「四大家族」或陳翰笙說的「五大集團」。所謂「四大家和其他官僚資本集團的內在矛盾」，其中說的「其他官僚資本集團」，在「四大家」以外，即使有，也是陳翰笙所說的「政學系系統」，即行政長官所代表的系統，至少是以此系統為主要的呀。陳伯達說得不錯，這種官僚資本就是近代中國底金融資本（參看本期「書評」）。中國帝國主義正是這個金融資本底政策呀。

一個國家，是殖民地，同時又是帝國主義，——這在歷史上並非沒有前例。帝制時代的俄國，在某種意義下說，也是殖民地，因為牠的工業和交通方面很大部分的資本是外資，是英法比諸資本家們底資本，牠的經濟和政治常常受英法諸國所左右，牠的外交尤其受英法諸國支配，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站在協約國方面作戰也可以由此解釋的；但同時牠又是帝國主義國家，牠同諸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那樣，侵略波斯，土耳其，中國，朝鮮，以及中央亞細亞和暹羅比爾亞諸弱小民族。現今荷比兩國，領有很多的殖民地，僅次於美英法三國

，但這兩國本身怎樣呢？能完全獨立麼？不，牠們是在其他強國羽翼之下獨立。例如荷蘭，牠現在事實上是英國保護下的國家，但牠正在鎮壓印度尼西亞底解放運動。

自然，中國在獨立性方面，不及當初的俄國，也不及現在的荷比，中國金融資本更加是美國金融資本底「附屬物」，但從俄荷比諸例仍可以看出，一個國家自身受他人侵略仍能同時侵略弱小民族，是沒有甚麼奇怪的。

其次，我們應當把此次台灣事件看做一個革命，與大陸各地進行的種種反對政府的運動——如上海攤販事件，勸工大樓血案，諸城市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工人經濟罷工，農民反對徵兵徵糧，甚至各地進行的內戰，——都不同。

事件起因是頗微小的。二月二十七日，在台北，台灣首城，警察干涉小販售賣私煙，爭執中打死了一個老太婆，以致引起市民公憤，警察向人羣開槍，又打死了一個市民。次日，羣眾聚集了數千人，搗毀專賣局，包圍長官公署，毆打「外省人」，即大陸上去的中國人。長官公署衛隊開槍，又殺死了好多台灣人。自此以後全城沸騰了，中國在島上的軍隊很少，祇有一萬人，其餘的都調來大陸從事內戰了，駐在台北的尤其少。行政長官指揮下的武力祇够保護若干機關安全，不能維持全城治安。自發暴動起來的民衆紛紛組織「委員會」，小委員會集合為一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得到了長官公署承認。「處委會」接收了廣播電台，報紙，電話等等，負責維持本城治安。全島其他縣市羣眾也很快起來，組織了同樣的委員會，除了高雄，基隆，新竹三地方以外，完全奪得了政權，奪得政權時並非沒有經過流血鬥爭的，有幾個縣長被羣眾殺死。羣眾未曾完全奪得政權的地方，尤其在政治中心的台北，都已經實現「雙權政制」（或譯「兩重政權」）了，即一方面是長官公署或縣市政府，牠們代表了舊的官僚政權，牠們在羣眾憤怒面前為自己生存着急，牠們的武力僅可自保，他方面是「處委會」，牠們是新成立的政權，牠們在各地召集羣眾大會，代表了和平的和武裝的羣眾底力量。台北「處委會」分為總務，聯絡，調查，治安，救護，財務，宣傳，糧食等組。儼然是一種政權機關了。順便說一句，這就是「兩重政權」。所謂「兩重政權」是說：一方是羣眾新政權，一方是官僚舊政權。現在有人，一面否認中國大陸已開始革命（這否認是對的），一面又把國共對立看做「兩重政權」，可見他並不懂得「兩重政權」是甚麼。

「兩重政權」是革命過渡期暫時的現象，舊政權和新政權在不斷鬥爭當中，非前者消滅後者，即後者消滅前者，決不能長久並存的。這一點，在舊政權

方面看得很明白。行政長官，於事件次日就急電大陸調兵了，在軍隊未到之前，他施行詭詐。就在急電調兵那一日，他接受了羣衆底要求（賠償，懲兇，解嚴，釋放被捕市民，禁止軍警開槍等），承認了『處委會』，保證不以武力解決而以『政治解決』此次事件。他說：『我的最大的德性就是寬大，不以怨報怨。』上層妥協的領袖組成的『處委員』（凡是自發的革命都是這樣的，都是妥協的甚至一向反對革命的分於初期獲得革命領導權，如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彼得格拉底社會革命黨和門雪維克的蘇維埃）信以為真，於是忙着商議要求條款，向舊政權提出，希望舊政權和平地讓給他們。這要求一共三十二條，其中主要是台人治台。可是此時軍隊調來了。從三月八日起，憲兵由福州運來，預備去佔領日本的軍隊由上海運來，一登陸，行政長官便翻臉了，不僅不肯批准『三十二條』，而且以『三十二條』為罪狀，下令解散『處委會』，重新宣佈戒嚴，實行屠殺羣衆。從八日夜裏起至十三日止，台北城洗了一次血浴。一卡車一卡車的軍隊，架着機關槍，拿着自動步槍，在街上馳騁，看見台灣人就開槍，而且進入店舖和住宅去殺人。其他地方也是這般。『密勒氏評論報』主筆小鮑威爾事後親去台灣調查，記載了種種難以相信的慘無人道的屠殺行為，據他估計，全台灣已經殺死的至少在五千人以上，關在牢獄的也有幾千人，這些『犯人』常常拖出來槍斃。

旅滬台灣人，四月十日招待新聞界，報告了如下的事實：（一）基隆軍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拋入海中。（二）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衆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基隆軍隊割去青年學生二十人之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戮死。（三）台北將所捕平民四五十名由四層樓上推下跌成肉餅，未死者再補以刺刀。（四）高雄將人釘在樹上，聽其活活餓死。（五）卡車上巡邏兵見三人以上之民衆即用槍托擊殺。（六）哨兵遇路過民衆不問情由開槍擊殺。（七）各地大批逮捕平民未經審訊，即綁出槍決或半途處決。（八）嘉義台南一帶人民因蔣主席，白部長一律從寬究之廣播後，向當局自首竟亦被捕槍決。（九）軍隊以清鄉為名入民家搜查，將財物取去復殺人滅口。（十）被殺害之人民以青年學生為最多。一般人民次之，社會中堅又次之，新聞記者亦不能免，真正流氓人多被編入別動隊，用以殺害民衆。（十一）封閉五家民間報紙。

台灣革命就是這般被中國總督用最野蠻的手段撲滅了。現在祇剩下一部分人，攜帶武器，逃往山上，做遊擊戰爭，其命運如何，尙不能說。現在台灣全島在恐怖氣氛籠罩之下，政府公佈聯保連坐法，規定出事地點一百公尺內人民

及鄉里長和附近鄰居都應為此事負責。

以上這兩種看法，——台灣事件是殖民地反帝國主義運動，牠而且發展為革命，實現了雙權政制，——是一般人評論此次事件時所忽略的，但非這般看法，我們便不能做出必須的結論和得到應有的教訓。

如果不把台灣看做殖民地，我們便不會承認台灣人有民族自決的權利。中國革命黨綱早就有『民族自決』一條了，但以前是對滿蒙回藏苗等弱小民族說的，現在應當把台灣人算在裏面。台灣人大部分是漢族，他們的語言，習慣風俗，同福建廣東一帶居民差不多，但這並不能阻止我們給予台灣人民自決權，因為我們並不重視血統差異，而注意經濟，政治和文化因素。台灣人自從鄭成功以來就成一單位同大陸對立的，割讓日本以後五十年間又發展了與大陸不同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台灣人和大漢族之差異，決不減於，例如，烏克蘭人和大俄羅斯人之差異。蘇聯憲法上已經承認烏克蘭人有民族自決權，甚至有權退出蘇維埃聯邦，那麼革命黨也應當承認台灣人有此權利了。

否認台灣人有自決權的，不僅是當權的黨派，而且是在野的黨派，連民主派在內。他們除否認台灣人是一種不同的民族之外，還提出一個論據，即說：台灣地方小，資源不齊備，不能形成一個獨立國家，如果離開了中國，就會落入他國之手，甚至還會被日本奪了去，所以不論中國政府如何腐敗，台灣人如何受壓迫，仍不可脫離中國的。

但是，在現在的世界之中，台灣固然不能形成一個獨立的國家，難道其他許多殖民地，例如菲律賓，能够形成一個獨立的國家麼？以嚴格的自給自足意義說，連中國自身，甚至連法國那樣的國家，也是不能獨立的哩。我們卻不能因此否認菲律賓有獨立權利。

何況就民主運動利益來說，我們也應當承認台灣人有自決權。『民族自決權』，本是民主口號之一。恩格斯說過，壓迫他民族的人，其本身也是不能自由的。台灣在國民黨政府手裏是一個有力的工具去撲滅民主運動。政府用於內戰的『資本』，大家知道是美國供給的，但不知道其中有頗大部分是台灣供給的。台灣出了幾師壯丁去參加內戰，米糖及一切物資運到大陸來的也有好多用於內戰。這是一個實例證明了恩格斯底話。

至於說台灣會成爲他國底殖民地，那是可能的，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台灣人有自決權利。如果台灣人覺悟了不能形成一個獨立國家，而必須投靠一個較好的主人，則他們當然有權利這般做。這裏問題在於我們自己，我們如果能够

## 評書

## 中國四大家族

陳伯達著 長江出版社出版，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從事實上證明台灣在中國統治下比在其他國家統治下都更幸福些，那麼台灣人決不會決定離開中國。但如此更應當承認他們有自決之權。

我們如果把此次事件看做革命，就能够得到許多可寶貴的教訓，對於台灣人以及對於我們自己。

此次台灣革命有許多多可為我們借鑑的。

首先，這是城市羣衆暴動，而且是首城的暴動，其他縣市以及鄉村則受首城領導。英，法，德，俄諸國革命都是這樣的，中國一九二五年的革命也是這樣的。這就告訴我們，中國將來第三次革命也應當是這樣的。凡幻想以鄉村農民戰爭為主可以完成中國革命的，終必會失望。

其次，羣衆暴動一起來，立即組織『委員會』，立即成立『兩重政權』機關，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和此次戰爭末期歐洲諸國民衆暴動一樣的。由此可以知道未來中國革命也應當走這條道路。台灣底『委員會』就其階級成分說，固然不能逕稱為蘇維埃，但未來中國底『委員會』或其他名稱的機關則必然是蘇維埃。

其次，暴動初起時所以如此順利，是因為軍隊調至大陸作內戰；以後所以失敗，是因為軍隊從大陸調過來；而軍隊所以如此迅速而便易從大陸調過來，又是因為上海和福州一帶沒有革命，沒有羣衆運動。由此可見台灣底解放是與中國革命息息相關的。台灣人應當與中國工人和農民聯繫起來。

最後，我們既然把台灣事件看做殖民地革命，就應當注意這革命中的階級分化。不幸，關於這一點，我們知道得太少了。我們不知道那些高等台灣人（資產階級）和那些下等台灣人（工農）是否發生了鬥爭，『三十二條』中有幾條是下等台灣人提出的，在『三十二條』以外下等台灣人是否提出其他要求。可是從我們能够獲得的材料中不無蛛絲馬

政論界已經漸漸從浮泛的政治分析進而為更切實的經濟研究了。人們對於國民黨政府底政治，經過八年戰爭，尤其兩年勝利之後，已經認識得相當充分了，現在急欲進一步知道做這個政治基礎的中國經濟究竟是什麼。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本是十餘年前熱烈辯論過的，至今這個問題仍能引起人興趣。但現在人們需要的，還不是那種屬於社會學的，『學術性的』，比較抽象的問題，而是另一種問題，更切實的，更具體的，更直接與政治和行動有關的問題。官僚資本問題，美國開發中國問題，四大家族或五大集團問題，以及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有無功效問題等等，特別引起人們注意。這些問題是有相互關係的，可以說是同一問題之幾個方面。

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據我們所知，要算陳伯達先生著的『中國四大家族』一書寫得最好了。此書底好處就在於搜集了極廣博的材料，加以分析和排比，由此得出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獨佔統治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這個結論。書中既有這樣的真憑實據，我們對於這個結論就毫無懷疑餘地了。

中國經濟，政治以及文化事業，完全操在四大家族手中！——或者說操在『五大集團』手中，如陳翰笙先生在美國發表的一篇文章所說的。所謂『五大集團』，乃是在那四大家族之外再添加一個『政學系集團』。這點雖與陳伯達先生所說有點出入，但在我們今天注意之點上是無關宏旨的。總之，現在中國經濟乃是獨佔的經濟，乃是操在少數幾個家族手中的獨佔經濟，而國家內政、外交以及文化事業，則是這個獨佔經濟所施行的政策，即都是符合於牠的利益。

如果這個結論是正確的（我們毫不懷疑其正確性），那麼由此我們就應當斷言：現在中國不僅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而且是金融資本主義的國家了，中國資本主義已經從自由競爭階段走到獨佔階段了。

可是，這裏，陳伯達先生就與我們背道而馳了。他也承認四大家族所代表的是『金融資本』，但他說這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金融資本，與帝國主義國家獨佔的金融資本底形成過程，性質及其活動，是完全不同的。』（見二頁）他又認為四大家族所憑藉的中央交農四大銀行，其業務『不是資本主義的性質，而是更集中的封建與買辦的性質；其發展并不是反映國民經濟與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恰是反映了國民經濟的破產與資本主義的不得發展。』（見二五頁）總之，陳伯達先生認為中國的『金融資本』是封建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同時，陳翰笙先生在上引的文章中也認為『五大集團』所代表的官僚資本是『前資本主義的』。這兩位陳先生都否認中國現在已到資本主義階段，都以為資本主義尚在中國發展路的前面，即都幻想中國能够從獨佔退回自由競爭去，或能够從金融資本退回工商業資本去的。

金融資本支配經濟，政治以及文化事業，如陳伯達先生竭力向我們證明的，——這樣一個社會，難道



跡可尋。暴動是下等人實行的，而且由下等人領導的，但是相當成功之後上等人就出來領導。小鮑威爾說：『三月三日，暴動性質顯然改變了，那些『流氓』領袖不見了，而社會聞名的台灣人走出來領導民衆要求政治的和經濟的改革。』台北『處委會』就是這些人組成的。『處委會』領袖王添燈是『一家報紙底主持人，平日頗反共。』（見『台灣』春），文匯報）行政長官之承認這個『處委會』，固然是爲了權詐，但也與其中成分有關，難免有幾個委員事先經過長官同意，長官還派了公署中五位處長參加『處委會』。殖民地資產階級本性上是傾向於改良和妥協的。二者正表現了台北『處委會』底性格。其他縣市底小『處委會』，有幾個比較堅決些，也許是下等人，『流氓領袖』，參加得多罷？至於某國大代表擁護長官而反對暴動本身，甚至憤然說『我要脫離台灣籍』，則又當別論了。

假使說台灣人內部的階級分化並不明顯，但我們決不懷疑這存在，並不懷疑這分化將日加深。台灣工農自己雖無多大經驗，但中國，印度，菲律賓，印尼諸國兄弟輩底經驗可以告訴他們的。總之，他們不信任本島上的社會聞人，總是對的。他們應當反對這些聞人來領導他們的運動。

至於我們大陸上的中國人，中國的工農羣衆，我們則始終贊助台灣底解放運動，承認台灣人有民族自決權，不管這運動是台灣聞人所領導的，還是台灣工農所領導的。

## 國際鬥爭

還是封建的或前資本主義的社會麼？難道不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麼？一個社會，無論有多少封建殘餘，無論封建勢力尚在活躍，但既然城市支配了鄉村，工商業支配了農業，金融又支配了工商業，而且直接去支配農業，那麼這個社會便是道地的資本主義社會，其中所有『封建的』『半封建的』『前資本主義的』成分，或者是在迅速消滅之中，或者正是資本主義爲自己利益扶植起來的，與資本主義本身結不解緣的。把這樣一個社會說做是封建的或半封建的或前資本主義的，那就是把次要的性質視爲主要的性質，而把主要的性質視爲次要的性質，或簡直閉眼不視這主要的性質。

說中國是半殖民地，說中國『金融資本』是買辦性的，是外國帝國主義扶植起來的，是帝國主義國家獨佔的金融資本之附屬物，——這話並沒有人否認，而且不能否認。但這不能證明中國還是封建的社會，反而證明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國是半殖民地，中國有了買辦性的金融資本，爲帝國主義金融資本之附屬物，——這是表示甚麼呢？這是表示資本帝國主義已經如此深入中國，如此動搖了毀壞了中國舊時封建的或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而支配之了，已經能夠爲資本主義利益去保存或甚至發展若干封建的或前資本主義的成分了。殖民地資產階級，買辦與否，總是模擬帝國主義國家資產階級的，好像中國電影模擬好萊塢一般。中國金融資本照樣地獨佔工商業和農業，照樣地把『經濟的和政治的直接合而爲一』，照樣地獨佔文化事業，照樣地壓迫和剝削境內弱小民族。

但若以爲中國金融資本和帝國主義國家金融資本毫無區別，那也是錯誤的。二者之間確有區別。區別在那裏呢？區別僅僅在於二者發展條件不同。帝國主義國家金融資本是獨立發展起來，而中國金融資本則是過遲的，在外國金融資本『扶持』下發展起來的。譬如兩株蘋果樹，一株是在沃土之上陽光之下生長起來的，另一株則是在瘠土之上，或暗室之中，或其他大蘋果樹遮蔭之下生長起來的。後一株樹也許不會夭折，也許能夠開花而且結果，但是同前一株樹畢竟有所區別，例如高低相差得很厲害。一切區別歸根結柢都是由於發展條件不同。可是後一株樹畢竟結了果了，雖然是苦澀的，不中吃的，我們總不能否認牠是果，總不能幻想：變更一下環境可以使這果還原爲花，使這結果的樹還原爲幼苗。中國金融資本比起美國底來，是小巫比大巫。美國統治菲律賓好久不出亂子，中國統治台灣不到一年半就鬧出那場大禍了。雖然如此，我們仍當把中國資本主義看做已經發展到最後階段的了，已經成熟了的，再不能退回到開花時代了，再不能退回到幼苗時代了。又譬如早種的麥子和遲種的麥子，雖然相差很多日，但遲種的如果能够成熟，即使成色差些，二者收穫的日子也是不會相隔多遠的。

既然明白了中國是在四大家族所代表的金融資本支配之下，就應當做出結論說：中國資本主義不僅發展了，而且成熟了。由此又應當定出革命鬥爭上適宜的戰略和策略。可是陳伯達先生做出了不同的結論。他以爲中國還在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社會，還未發展資本主義。這是大錯特錯的。

陳伯達先生底錯誤，不是他自己的錯誤，乃是他的黨底錯誤。把一國底統治階級還原爲若干『家族』，如法國底『二百家族』，美國的『六十家族』，以及中國底『四大家族』，這在我們看來不過說明資本愈加集中和集合，愈加獨佔化罷了，別無何種意義。但在陳伯達先生和他的黨看來，則除此意義以外還有其他的意義，即把統治的資產階級強分爲『獨佔的』和『自由的』兩個部分，而圖謀與自由的資產階級聯

## 動盪中的西班牙

這幾天，爲了恢復君主國問題，西班牙又成爲人們注意的一個中心了。佛郎哥爲甚麼不能照舊統治下去呢？爲甚麼要同舊王朝談判而最後宣布自己爲終身元首呢？不知道西班牙內情的人，恐怕會把這一切歸咎於國外的壓力，其實我們雖不否認國外壓力在這裏有作用，但主要的原因，無可否認地，是由於國內的動盪的。下面是一些未曾見於中國報紙的西班牙消息。

一月十七日，巴黎各報登載西班牙罷工蔓延很廣的消息，據說以前幾星期中，巴塞倫那城幾個大工廠哲倫那，包管羅，特靈雪，畢馬管，和「工業西班牙」，都發生了罷工。就中，哲倫那廠罷工特別引人注意。政府派了軍隊去驅逐工人出廠，并代替工人工作。可是工人把自己生活痛苦說給兵士聽，而且告訴兵士以罷工理由，兵士都很感動，他們和工人聯歡，他們的同情很快增長起來，最後拒絕破壞罷工命令，軍官們不得不從工人區把軍隊調走。這件事成了街談巷議對象，工廠周圍，露天底下，羣衆聚集起來討論此事，警察也不敢干涉。以後罷工工廠更增加了。巴塞倫那沿海區域煤氣工人舉行了罷工。本城一家大報紙「郭獨」自辦的造紙廠工人也舉行了罷工。警察奉了資本家命令，常常壓迫這些罷工，有時把工人逐出工廠，有時成羣逮捕罷工者，但工人抵抗力很強，警察不得不讓步，被捕的工人大多釋放了。最後，資本家也祇好不願政府禁令，答應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資和配給更好糧食的要求。

罷工潮現已擴大至其他城市了。特別有意義的是馬德里五金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參加者一千人。這是好多年來西班牙首都所未有的。

盟去反對獨佔的資產階級。這就是所謂「人民陣線」底路線。「二百家族」「六十家族」等等，正是「人民陣線」時代喊出來的，或那個時代喊得最響的，——可見這并非偶然的事情。中國共產黨現在走的正是「人民陣線」路線。牠起初要同整個國民黨組織「聯合政府」，要「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共同建國」（周恩來說），換一句話說，即牠要同「四大家族」聯盟來統治中國。此時陳伯達先生決不會著作他的「中國四大家族」的。政治協商了一年之後，證明這種聯盟不能實現了，於是中國共產黨便要聯合「四大家族」以外的資產階級來反對「四大家族」，於是陳伯達先生才寫他這本著作。書中一開始就攻擊三種幻想：希望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能」（一）放棄內戰實行和平，（二）放棄法西斯專政實行民主，（三）不當美國帝國主義工具實行民族獨立。他說有不少的人抱有這三種幻想，所以他才寫這本書。可是他忘記了抱這三種幻想，而且散佈這三種幻想的，不是別人，正是中國共產黨自身，而且是不久以前的事情。書中九八頁至九九頁很明白地說出那個新路線：「事實完全證明，這種罪惡的「四大家族，這些完全寄生的腐爛的東西，是不能夠有甚麼生命的，而民族自由工業，雖然是被美國帝國主義與「四大家族所摧殘，然而牠們却具有歷史進步性，是有一定歷史生命的東西。……四大封建買辦家族，在美國帝國主義底直接援助之下，對於民族自由工業正在不顧一切地加以毀滅，而民族自由工業要戰勝這被毀滅的惡運，就必須與農業的農民解放鬥爭結合起來。依賴農民解放的基礎，以保證民族底解放，以廣大發展社會的生產力。這才是民族自由工業底唯一出路，再沒有也不能夠有別的出路。」可是這話又是幻想，并不減於開始時所攻擊的那三種幻想呀。四大家族乃是中國資本主義成熟的果實，如果這果實掉下來，樹株本身也就要枯萎的，決不會再退回去發展民族自由工業的。而且現在帝國主義獨佔統治的世界也不容許中國發展民族自由工業。希望四大家族讓位於民族自由工業，就等於幻想世界各國金融資本能退回到工商業資本去一般。

事實上現在中國所謂「民族自由工業」究竟是甚麼？牠不是別的，祇是抗戰以前時代中國資本主義舊形態之殘餘物。陳翰笙先生那篇文章雖然材料少些，但有一點比陳伯達先生更正確些，即陳翰笙先生認爲現在若干家族支配全國經濟這種形態，并非古已有之，也不是國民黨專政以來就是這樣的。陳翰笙先生認爲這種新形態是從一九三八年開始的，這年起中國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話很對。我們可以說，抗戰以前中國是英日美法德諸國共同開發的殖民地，那時在諸帝國主義國家競爭之下，中國的「民族」資本還未曾像現在這般集中和集合，還有更多的「自由」活動餘地。一九三八年以後，除淪陷區歸日本獨佔外，「自由區」也漸漸落入美國獨佔了，因爲德法英諸國先後退出了。勝利之後，連淪陷區也落入美國之手。戰前在多國競爭下的資本主義形態，當然必須改造，使之適應於一國獨佔。四大家族獨佔就是這個改造底產物。但改造是困難的過程，舊形態并不能立即消除而完全讓位於新形態。舊形態掙扎着，代表舊形態的人物走到反政府的陣營中來，他們向農民和工人獻殷勤，以左派姿態出現於政治舞台，希望得到工農贊助取四大家族地位而代之，如同二十年前國民黨所經歷的。這就是諸中間黨派，尤其民主同盟領袖們，所走的路線。四大家族固然沒有甚麼生命力，民族自由工業也不見得有更多的生命力。

惟有工人以及工人領導下的農民，才能代表一種歷史進步性的有生命力的經濟。惟有工農聯合的努力才能推翻四大家族而在中國建立一個合理的社會，即社會主義的社會。很奇怪的，陳伯達先生在他的書中

西班牙「全國總工會」(CNT)是有優良傳統的工人團體，牠的巴塞倫分會委員們，被佛郎哥底反動警察逮捕去了，此外還有許多工人運動戰士被捕。

馬德里附近，加拉班雪爾監獄中的政治犯，也感染了獄外鬥爭情緒，於去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二日舉行一次絕食，爲了抗議監獄長虐待幾個政治犯。他們在監獄中受苦多年，依然保持着如此英勇的精神。

其他鬥爭消息自然還有，但因西班牙是法西斯國家，新聞報道不能自由，我們難於知悉。但根據上面所說，我們已可知道，自從革命失敗以來，西班牙羣衆現在又開始覺醒了。舊創傷已經相當康復了，而軸心國戰敗又使得佛郎哥地位因孤立而動搖。現在祇是如何去代替佛郎哥政制問題。外國帝國主義者以及本國資產階級，要改變佛郎哥政制，但害怕羣衆在這改變過程中發生了作用。他們要一種沒有羣衆干涉的改制，一種最便易的改制，於是提出復辟問題，即想簡單地拿舊王朝繼承者唐璜來代替佛郎哥。這個計劃，顯然是要遭受羣衆反對的。於是人們想出了一種「過渡的政制」，即成立一個含有君主黨，共和黨，以及勞工「領袖」在內的政府，而以軍隊將領爲靠山，藉軍隊來維持「治安」。西班牙社會黨現在也贊助這個計劃。

佛郎哥企圖與君主黨妥協，但不成功，近日他宣布的改革自然不能解決問題。西班牙又有一個大門爭在我們面前。但願此次能不被社會改良黨和史大林黨所葬送！(盛)

### 西歐諸國罷工

西歐罷工鬥爭并不限於西班牙一國，雖然與佛郎哥改制問題聯繫起來看，西班牙罷工含有更直接

記起了農民，却忘記了工人。他在論農業獨佔一章中指示農民鬥爭的出路，在論工業獨佔一章中却僅僅指示民族資產階級鬥爭的出路，而未曾指示工人鬥爭的出路。他號召民族資產階級和農民聯合，却不號召工人聯合。他簡單忘記了中國工人。他殷勤搜集材料，仔細分析和排比，祇爲了替民族資產階級服務，而非爲了替無產階級服務。

陳伯達先生這本書，以其廣博的材料和仔細的分析，讓我們知道中國資本主義集中化和獨佔化到了甚麼程度，但從這個認識出發，我們主張工農聯合的人做出的結論，是與他們主張資農聯合的人做出的結論，幾乎是沒有一點相同的，由此可見他和他的黨所代表的是那一階級的利益了。(唐盛)

的政治意義。

與西班牙罷工潮同時，比利時發生了戰後最大的罷工，那是安特衛普碼頭工人支持了四個多星期的罷工。罷工爆發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本質上是要求增加工資的，因爲工人工資不及戰前二倍而物價則超過戰前四倍。社會黨領導的比利時政府派了二千名兵士去代替工人搬運貨物，而且根據共產黨部長馬多去年所頒佈的命，拒絕給予罷工工人以失業救濟金，以此希望工人屈服。以社會改良黨和史大林黨爲主的工會官僚們不但不領導罷工，而且反對罷工。但第四國際比國支部，「國際主義共產黨」是積極贊助罷工的。牠定於一月六日召集罷工大會。這消息一宣佈，工會官僚們也急忙於六日以前召集大會，而且表示贊助罷工及付給失業救濟金了。大資產階級底機關報「晚報」很正確地說：這是工會領袖們圖謀收回他們被托派奪去的勢力。托派戰士朵爾曼在工會官僚召集的大會上向羣衆演說要求隨物價高漲增加工資，并號召總同盟罷工來達到這個目的。資本家們看見大勢已去祇好讓步，增加了百分之三〇工資。爲了托派底活動，所以最近比國總工會大會中已可看出有一個左翼形成起來。

英國運貨汽車工人罷工也得到了勝利。英國這部分工人勞動條件本來是遠遜其他產業工人的，他們的正式工會領袖又是英國工會中最善於諂媚資本

家和出賣工人利益的。工會官僚和工人羣衆對立如此尖銳，以致總書記台金每次罷工出席羣衆會議時候，都須請警察護衛他，否則要被人毆打，或者逐出會場。此次罷工并未獲得工會上層領袖批准，牠是下層領袖通過的，這些領袖，即各分會負責人組織了一個「中央罷工委員會」來指揮罷工，各區，各市場，也有罷工委員會組織。起初，「中央罷工委員會」沒有經驗，又受史大林派操縱，不能盡職，會決議復工，但羣衆不答應，繼續支持下去。工

黨政府派出軍隊來代替工人工作，可是碼頭工人，搬運夫，以及一切與運輸業有關的工人立即起來抗議，舉行同情罷工，其他部分工人，如鐵路工人，客車工人，煤氣工人，石油工人等等，也準備於政府繼續派出軍隊時舉行罷工了。這是一九二六年英國總罷工以來第一次，一部門工人底鬥爭得到其他部門工人同情援助。最後資本家屈服，答應了工人要求，即每星期減少爲四十四小時工作，而不減少工資，每日超過八小時工作須另付工資，例假日休息。資本家報紙認爲工人得到「完全的勝利」。此次罷工中，第四國際英國支部，「革命共產黨」，是唯一的一黨，不僅贊助罷工，而且號召其他部門工人起來援助。

法國印刷工人罷工使得巴黎好長久沒有報紙。印刷工人要求的是增加工資百分之二五，爲了抵補

通貨膨脹損失。法國共產黨公開反對這個罷工，指斥工會和罷工工人為『托派』。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也不能出版。共產黨曾以『人道報保衛委員會』名義組織了一羣打手，衝破報館周圍的封鎖線，那是印刷工會派出糾察隊封鎖的。但『人道報』依然出版不成。法國托派確實贊助罷工，他們的週刊『真理』是罷工中唯一能出版的巴黎報紙。

### 東方也有罷工潮

新加坡六百四百個市政工人於一月間舉行罷工，政府派一千二百名日本戰俘來代替工人工作，工人勸告戰俘停止工作，政府則派武裝警察干涉工人活動。

印度加爾各答六千電車工人亦於一月間罷工，要求每月工資增至三鎊（等於美金十二元）。孟加拉政府禁止罷工，主張用仲裁方法解決，工人不聽同域電氣工人和碼頭工人也在準備罷工。（盛）

### 對於越南屠殺的抗議

東方不僅有工人罷工，還有民族獨立戰爭。法國自己剛從外國統治之下『解放』出來，就要恢復牠對於越南民族的統治了。法國這個企圖顯然獲得所謂聯合國（連中國在內）默許。但越南民族反抗這個企圖，不惜與法國帝國主義作戰。在『聯合政府』之中的法國共產黨應當替法國這個行動負責。

第四國際法國支部，『國際主義共產黨』，於十二月六日和一月二十四日兩次在巴黎召集羣衆會議，抗議越南屠殺，但都被警察解散了，參加的北非洲人，越南人，及許多黨員，被打受傷。第四國際美國支部，『社會主義工黨』聯合另一個托派組織，美國『工人黨』，亦於一月二十五日在紐約法國領事館門前舉行示威，要求法國退出越南，要求

美國政府勿以軍火供給法國。示威羣中有越南僑民參加。示威者遞送一份抗議書給法國領事，除要求一切法國軍隊立即無條件退出越南外，還抗議巴黎警察之解散羣衆會議。越南僑民亦曾邀請美國共產黨參加此示威，可是共產黨拒絕了。（盛）

### 美國托派統一組織

第四國際美國支部，『社會主義工黨』，一九四〇年因爭論蘇聯問題，分裂為兩派，少數派以夏赫脫曼為領袖，另外成立『工人黨』，未得第四國際承認，但仍以托派自稱。戰爭停止之後，『工人黨』，要求統一組織，雙方談判了好久，未能成功。今年二月間，由於『工人黨』建議召集一個『臨時大會』，並保證服從大會決議，『社會主義工黨』遂同意統一。兩黨於『臨時大會』以前將進行討論各種爭執的問題，以『黨內生活』特刊登載爭論爭論文字，兩黨支部亦可先行聯合開會。確定的統一，則在『臨時大會』以後。

第四國際這個有力的支部之統一，對於未來美國革命發展將有極大的助力。（盛）

讀者  
通信  
（一）繼續撐持我們的新旗

新旗社諸先生：

河山遙隔，雖然我們素不相識，是一顆顆追求真理的熾熱的心將我們串連在一起。我們是貴社的一羣讀者，同時也繼續不斷地做着初步的啓蒙工作。但是，我們不能經常地讀到你們的刊物，因為這是統治階級所深惡痛絕的。

閱貴社第十三期後面一則啓事，因事實困難改

為月刊，這訊息使得我們難過。的確！現在的雜誌很多，但找不到一份能真正替勞動大眾說話的刊物，我們以為貴社是唯一的代表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旗幟，『難道連這也不能撐持嗎？』這問題苦惱着我們，我們感覺到恥辱，我們感覺得自己應當義務地担任起一部分責任，希望新旗能滋長，開展，成為中國革命先導的一面大纛，一盞明燈。

除了虔誠地祝福你們堅苦地支撐這一面新的旗幟外，我們內心充滿了崇高的敬意，這裏，我們貧苦的一羣，湊集了肆萬塊錢作為物質上之聲援。真理是曲折前進的，在不久的將來，當暴風雨帶着雷聲迤邐響起的時候，願我們共同邁步前進，餘再談。祝

奮鬥 讀者 陳康成敬上

三十六年一月三十日

編者按，自從本刊第十三期向讀者呼籲以來，我們收到好多讀者來信鼓勵，并解囊助，茲選載此信，藉見一斑。我們固然需要物質的援助，但也需要精神的鼓勵。

### （二）甚麼是機會主義？

新旗社諸先生：

讀了貴刊第十四期『中國機會主義者與民主口號』一文後，我把某雜誌座談會記錄翻出來重讀一遍，覺得你們稱他們，座談會參加者，為『機會主義者』，是不對的。所謂機會主義者，如考茨基，史大林，毛澤東一流人，是主張階級妥協，反對奪取政權的。座談會參加者并不是這樣，他們并不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并不主張用議會式的法律條文來解決問題。他們都是些青年人，正在學習當中，難免有缺點。我認為座談會發言一般是對的，所缺少

的只有一點，就是沒有懂得：在過渡時期，民主口號是用作喚起工農走向鬥爭的一種工具。你們將『機會主義』銜頭送給他們，未免氣用事了。……

讀者 唐中流

卅六年二月十三日

中流先生：

你爲愛護某雜誌座談會而向本刊上期一篇文章提出抗議，我們是很歡迎的。我們一般歡迎讀者底抗議，無論抗議得對不對。如果抗議得對，本刊願意認錯和道歉。可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仍覺得本刊底立場是對的。

你說座談會底議論不是機會主義，你舉出這議論與考茨基，史大林，毛澤東等人議論不同，爲證據。我並不否認這個不同，但是要請你注意，機會主義底表現本是隨時代而不同的。考茨基一輩底機會主義表現於反對革命暴力，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史大林一輩底機會主義表現於反對世界革命，主張『一國社會主義論』問題上；毛澤東一輩底機會主義則表現於輕視城市工人力量，企圖與資產階級成立『聯合政府』問題上。史大林並不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也未會主張中國一國能建立

社會主義。所以僅僅拿機會主義在某一定時代的表現來概括一切機會主義，是不妥當的。現在，中國從左方反對毛澤東主義的營壘中，如果有機會主義產生，那多半會表現爲新的形式。辦證法要求我們時時處處要注意一種本質在不同條件下所表現的種種形式。我們既然不能斷言我們這一新營壘中決無機會主義產生，那就應當研究甚麼準繩可以判別一種傾向是否機會主義的了。與座談會發表同時，我們恰好接到 E. Germain 同志那篇文章，其中恰好給了我們所需要的準繩。這準繩就是說：凡不把民主看做一種口號或一種要求，不把民主口號或要求看做一種動員羣衆用的工具，反而認爲民主是一個階段或橋樑，必須渡過之後才能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就是機會主義。我們試拿這個準繩來衡量座談會。座談會是否機會主義，須看牠是否合乎 Germain 同志所設的這個準繩以爲斷。那麼請你判斷一下：座談會會說民主是口號或要求麼？不會！曾說民主口號或要求不過是動員羣衆用的工具麼？不會！曾說民主主義是一個階段，非先渡過不能走到社會主義階段麼？確實如此說！（例如十九頁上

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是代表兩個歷史的階段，但在落後國家從此階段到彼階段却是緊相連繫的。』）那麼他們就是機會主義者了，——或者，恰切些說，他們乃是合乎 Germain 同志所設準繩的機會主義者——，你如果認爲 Germain 同志所設準繩是對的，那就應當承認我們稱他們爲機會主義者，也是對的。你說他們『所缺少的只有一點，就是沒懂得：在過渡時期，民主口號是用作喚起工農走向鬥爭的一種工具。』你說得很對，很對。但是正因爲如此，正因爲他們『缺少』這項瞭解，他們才是機會主義者呀！

你說座談會參加者『都是些青年人，正在學習當中，難免有缺點。』你這話也說得對。他們是些很有希望的青年人，我們也同你一般地愛護他們。實在他們並不能替座談會表現的機會主義負責。他們是在那裏研究和學習。應負責任的，乃是座談會結論者，他的機會主義是有機的，是有歷史傳統的。我們的批評僅僅是針對他而發的。

記者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 中國革命悲劇

(續)

Harold R. Isaacs 著  
唐 威 譯

然而隨着羣衆運動之生長，尤其自從農民開始以組織爲武器向地主底權利和特權挑戰以來，這些青年人之中就有好多人開始反對羣衆和共產黨了。因爲他們自己就是地主家庭出身的。黃埔學生中這種階級分化很快就採取了有組織的形式，這些組織早已存在於更大的政治舞台上。已經在北方和中部活動的『孫文主義學會』，此時就在黃埔學生中獲得堅固的立足點。屬於共產黨的學生以及較急進的國民黨學生，則組織爲『青年軍人聯合會』。在一九二五年

幾次戰役之中，這兩派學生公開衝突了好多次。蔣介石努力在二者之間保持平衡，正如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他努力調處於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一般。當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出征東江凱旋回來時候，蔣介石請他的青年軍官吃飯。『他拍桌大罵他們』（見李芝龍著的『汪主席辭職』一書，一九二七年武漢出版），而且要求雙方組織從此和好。那時，無論如何，他需要統一的外貌。在這個『統一』問題上，蔣介石恰與鮑羅廷一致。這二人立場底共鳴，明

白反映了共產黨政策怎樣去迎合資產階級底要求。蔣介石底權力，同他的階級底權力一樣，此時尙未曾穩固。他還需要共產黨，還需要羣衆運動，還需要俄國人及其意見，其指示，其物質援助，來穩固他的地位。蔣介石本人底立足地還是在動搖之中的。政治上，他還是隸屬於國民黨那些文人領袖的，其中最重的人物是胡漢民和汪精衛，後者是孫文最寵愛的門徒。軍事上，他還有許多對頭，即是那些同樣攀附國民黨的軍官。蔣介石希望羣衆運動有力，把他湧上能發號施令的優越地位。這一點，也正是中國資產階級底目的和需要。

鮑羅廷，他的莫斯科教導者，以及中國共產黨諸領袖，則從這個前提出發，即認爲：革命要能成功，必需獲得資產階級合作。那時工農底獨立的強大的有組織的力量，並未會使他們感覺到依照工農直接利益決定方面之必要，甚至當工農與資產階級衝突時候，尤其當這個時候，他們也沒有感覺此必要。恰好相反，一種觀念漸漸凝結起來，成爲共產國際正式的學說，即說：國民黨並非與共產黨暫時聯盟的自由派資產階級政黨，而是『代表工農智識分子和城市民主派（即資產階級）的一種革命聯盟，其基礎就是這些社會層底共同的階級利益，當牠們爲了爭取國家獨立和單一的革命民主政府而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鬥爭的時候。』（見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問題決議案』，『國際通信』第四十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人們是依照階級利益底共同性來決定基本方向的，而非依照階級利益底衝突性來決定。於是產生了一種幻想，認爲資產階級和牠所剝削的工農羣衆，二者間能在共同地基本上反對帝國主義。正爲這個原故，鮑羅廷才把蔣介石看做國民黨領袖中最可信賴的『盟友』。在廣州的其他將軍，還是代表過去時代的，還是軍閥之中一部分。他們各人是自私自利的。至於蔣介石，則鮑羅廷認爲他是更能代表那部分資產階級，即共產國際信爲真能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資產階級。此外，蔣介石又會說激烈話，又會向鮑羅廷和羣衆表示他是最適宜做革命軍隊總司令的。所以鮑羅廷用盡一切政治手腕把他直接捧上去。蔣介石並不反對鮑羅廷心裏把他看做替羣衆利益服務的人。恰好相反，據說，他『常常告訴人以孫文吩咐他的話，即叫他聽從鮑羅廷，如同聽從他（孫文自己）一般。鮑羅廷報答他的，則是吩咐所有的人，不論共產黨或國民黨，都應聽從蔣介石將軍。』（見湯良禮著的『內史』二三四頁）當鮑羅廷『吩咐』人增加蔣介石權力時候，蔣介石便不難從他的俄國顧問口裏聽出他的故世的領袖底聲音。

一九二五年八月間，國民黨右派在廣州進行陰謀，結果刺死了黃埔軍官學

校底『黨代表』廖仲凱，他站在國民黨底極左翼。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和粵軍司令許崇智有唆使暗殺的嚴重嫌疑。（見路易·菲雪爾著的『蘇聯在國際事件中的作用』第二卷六四六頁）廣州右派此次陰謀底暴露，被鮑羅廷在幕後利用來排除異己者。他以最得意的那種巧妙手腕迫使胡漢民出國。許崇智及其他與陰謀有關的好多人，也離開了廣州。廣州工人忽然發現他們的新領袖竟是汪精衛和蔣介石，前者主持黨，政府和軍委會，後者則統率粵軍。爲了這個新職，蔣介石祇消立正，敬禮，叫喊『世界革命萬歲』，就足够了。

正當鮑羅廷和共產黨領袖們忙着同上層可疑的盟友進行新結合時候，羣衆運動已在大規模展開了。省港大罷工，全國各地經濟的和政治的罷工（參加者將近一百萬人），農民協會非常迅速的強大，全國反地主的戰爭開始進行，——這一切表明羣衆力量非常急劇地興起來。工農鬥爭自然造成了獨立的組織形式，羣衆經過這些形式居然能够出於本能地爭取自己的階級利益。

省港罷工工人自己組織了罷工委員會，又與廣州其他的工人聯合組織了工人代表會議，他們是要保衛自己的階級利益的。廣州的警察權力事實上操在他們手裏。拿某一官式報告裏的話來說，『已有六七縣農民公開向地主作戰了。』（見國民黨農工部底報告，『廣東農民運動』，一九二五年十月廣州出版。）軍隊也成了共產黨一種有利的活動地盤，尤其在一九二五年東江及他處戰爭以後，這些戰爭所以勝利，主要是由於有工農直接參加。祇因有這些勝利，廣州政府才能維持存在。政府權力正是建立在省港罷工工人和各縣農民底成就上的。連蔣介石也公開承認此事實。有組織的羣衆，以及軍隊中那個有決定性的部分，變成了整個運動底發動力。可是上層的結合阻止了羣衆去向政府索得甚麼切實有效的措施，以爲羣衆自己的利益，雖然政府是建立在羣衆頭上的。有幾項微小的捐稅是取消了。有幾宗顯著的苛政是廢除了。私有財產底神聖境界仍然是未經侵犯的。

人們始終未曾告訴共產黨黨員，說必須給予這個強有力的羣衆運動以一種合於自己利益的政治方向，以一種前途，以一種旗幟，使之能按自己的方式，依自己的利益，去干涉階級鬥爭進程。羣衆運動反而受了領袖們所催眠，領袖們不僅沒有教羣衆慎防國民黨同盟者，反而教羣衆完全信任上層那些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

一切權力，一切榮光，歸於國民黨及其領導者。這就是共產國際底方針，尤其是蘇聯共產黨領袖們底方針。史大林以及一九二六年一月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會議主席團其他人物，打了如下的電報給國民黨第二次全國大會主席團：

「領導世界第一次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之歷史使命和光榮，屬於我們的黨。……我們確信，國民黨將在東方完成同樣的使命，而且以此摧毀帝國主義統治亞洲之根基，……倘若國民黨能在現在的鬥爭中加強工農同盟，並依照這些革命基本力量利益所指示的道路走去的。……」（見『國際通信』，一九二六年一月七日。）

史大林此時已經形成他的獨特觀念了，即認為國民黨並非含有資產階級在內的『聯合戰線』，而是工農同盟底政治表現。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他告訴一羣中國學生說：國民黨的聯合組織可以『採取單一的工農黨形式，如國民黨那樣。』（見史大林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紐約出版，二一六頁。）

共產國際某些刊物於報道中國事變時已經開始討論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之遠景了。可是共產國際中央機關報則通告各支部：『近似於蘇維埃政制的國民政府已於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在廣州成立了。』接着，很得意地徵引蔣介石和汪精衛在國民黨大會上的演說。蔣介石說：『我們與蘇聯，與世界革命同盟，事實上，就是與所有的革命黨同盟，牠們正在共同鬥爭，反對世界帝國主義，實行世界革命。』汪精衛說：『我們如果要反對帝國主義，就不可反對共產黨。（大鼓掌）我們如果反對共產黨，就不能同時自命為帝國主義底敵人。（大鼓掌）』通告結論說：『國民黨底工作和鬥爭，證明孫文諸門徒仍舊忠實於孫文底根本思想。』（見『國際通信』，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一九二六年二月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贊美國民黨之對於其中右派的斥責，而且說這極斥責將『加強廣州政府底革命傾向，而確保國民黨能得無產階級底革命贊助。』（見『中國問題決議案』）正是在此次全體會議上，代表們在蘇聯諸領袖指揮之下，於胡漢民入場時，最熱烈地拍掌，以表示歡迎，胡漢民恰是國民黨右派大領袖之一呀！胡漢民爲了暗殺廖仲愷嫌疑原故，被逐出廣州而到莫斯科去，那裏他很快就當選『農民國際』領導機關，做『中國農民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開幕時，胡漢民也被邀請參加，代表國民黨向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總司令部致敬。

安德烈耶夫大廳，以前皇帝寶座所在的官殿，據正式記載，這日『當一大元帥』胡漢民穿着軍服走上演說台時候，發生了永不能忘的景象。幾分鐘長久，台上的胡漢民不能開始演說，因爲掌聲拍個不停。西方革命無產階級和東方被壓迫人民間的團結一致，這裏是表示得很清楚的。』（見『國際通信』，一九二六年三月四日。）

中國共產黨代表上台時也有人拍掌，但他不過代表東方被壓迫的無產階級罷了。『當胡漢民同志（！）……走上演說台時，掌聲拍得還更響些。這種表示歡迎的掌聲響了好幾分鐘，以後演說者每說完一句話都有掌聲繼起。』（全上）胡漢民底演說是值得徵引的，因爲我們不要忘記，胡漢民並非同大多數國民黨領袖一般，後來才忽然露出屠殺羣衆的劊子手而目的，他站在共產國際演說台上時候就已經是爲了參加暗殺左派領袖而被人從廣州逐出來了。

胡漢民說：『我代表中國民族，中國工農，中國被壓迫羣衆，表示感激之意，感激我個人能參加這次國際會議。祇有一個世界革命，而中國革命是這個世界革命底部分。我們的總理孫中山先生底口號，是與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底口號相一致的。再沒有一個人信任第二國際了。第三國際底威望，近來在中國大大地抬高起來。智識分子，很大部分的工農，整個無產階級，都參加了運動。國民黨口號是：爲了羣衆，亦即是同工農一起奪取政權。所有這些口號都是符合於第三國際政策的。……我覺得我是世界革命戰士之一，我向共產國際會議致敬。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萬歲！世界革命勝利萬歲！第三國際萬歲！世界所有共產黨萬歲！在場諸同志萬歲！』（全上）

共產國際底威望得到『整個中國無產階級』承認。中國資產階級自然有理由感激人們拿這個威望來支持牠了。連廣州商會發表的宣言也寫入『世界革命萬歲』口號哩。胡漢民自然不吝惜多喊幾個『萬歲』。因爲如此，他才能够於不滿一年之後幫助蔣介石去粗暴地縮短中國共產黨最優秀的青年黨員之壽命。爲了報答胡漢民叫喊的許多『萬歲』（共產國際從牠的中國資產階級盟友所得到的，除此之外沒有甚麼了），此次全會便宣言：『廣州政府乃是中國民族解放鬥爭底先鋒，足爲未來全國革命民主政制底模範。』而且號召中國革命者團結起來，『在最廣大的社會層次工人，農民，資產階級所締結的單一的民族革命戰線之內，於革命民主組織領導底下。』（見『中國問題決議案』）

爲了這個原故，在廣州的鮑羅廷才不喜歡羣衆運動中共產黨勢力底驚人發展。『共產黨黨員在新的革命政制中佔據的優越地位，……自然引起國民黨和共產黨領袖們底憂慮。鮑羅廷也很憂慮這件事情，一九二五年間他常常和汪，廖，胡，蔣討論這個問題。他說：『自從一九二四年改組以來，國民黨就分裂爲二，一部分擁護改組，一部分反對改組。但這分裂是不嚴重的，因爲左派一定會勝利的。嚴重的，將是左派本身底分裂。』他說這話，因爲他預見國民黨和共產黨會分裂。『由此可見，克服未來困難之唯一道路，就是左派領袖們能提出一個一致的主張。』（見湯良禮著的『內史』，二三三頁。）

鮑羅廷認為，唯一的道路在於所謂左派領袖之間的一致。這就是說共產黨應當與國民黨一致。這就是說羣衆應當服從資產階級政治領導。有一本圖謀替共產國際底中國政策做辯護的著作，認為廣州所以不能採取急進的改革，所以不能實行土地革命，是因為國民黨，「爲了混合的階級成分原故」，不能進行沒收私有財產。」（見菲雪兒著的『蘇聯在世界事件中的作用』，第二卷，第六四七頁。）國民黨底「混合的階級成分」要求保護資產階級利益。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是負有不能侵犯私有財產之義務的。換一句話說，國民黨並非一切階級在其中合作的政黨，更加不是甚麼「工農黨」，而是那種政黨，資產階級在其中強迫其他階級跟在牠背後走。

爲甚麼不能組織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攻勢呢？因爲廣州無產階級「太弱」。鮑羅廷想：「我們可以在廣州奪得政權，但我們不能保持這政權。我們會淹死在血海裏。」（全上）

「廣州無產階級弱點」在那裏呢？廣州政府是被羣衆運動浪潮湧上政權的，牠能否存在視有組織羣衆是否繼續支持牠以爲斷。在這點上說，廣州工人和廣東農民佔據了一個決定性的戰略陣地。牠們的「弱點」就在於那些強有力的羣衆組織缺乏一個獨立的政治遠景。一開始，即使不是工人政權的直接問題，也一定是粉碎資產階級反攻的問題，那時資產階級正在各方面公開動員。要粉碎資產階級反攻，祇有以自己的階級政策武裝工農，祇有領導工農去創立蘇維埃，能舉起羣衆政權巨棒去打擊那些坐在虛名政權位置上的中國克倫斯基們的聯亮。在這點上說，廣州無產階級是太弱麼？省港罷工委員會和代表會議，同廣州工人代表會議聯合起來，已經供給了雙權政制底框架。這些組織，已經執行了警察底權力，以及那種國家職務，如設立學校，法庭，醫院，甚至負起了建築一條從廣州至黃埔的公路之工作，牠們是能够施行全部政權的。牠們已經執行了同蘇維埃一般的職務了。同軍隊代表和農民協會聯合起來，牠們就代表了廣東一切政權底真實源泉。但是工人階級按此路線採取攻勢的問題，共產黨領袖們是從來未曾提出，或未曾考慮過的。爲甚麼？因爲這種能侵犯資產階級財產的攻勢，本身就含有必須終止與資產階級「聯合戰線」之意。

托洛茨基寫道：「我們姑且承認廣州工人還太弱，不能建立其自己的政權。但一般說來，羣衆底弱點是甚麼？就是他們傾向於追隨剝削者。在此情形之下，革命者底第一個責任就是幫助工人離脫這種奴隸心理。可是共產國際官僚們所做的工作正是與此相反的。他們拚命灌輸羣衆以必須服從資產階級之觀念，他們宣告：資產階級底敵人就是羣衆底敵人。」（見托洛茨基著的『中國革命

問題」新譯本第二九四頁。）

鮑羅廷說：工人若是採取一個更帶進攻性的政策，就會「淹死在血海裏」。自然，我們不能預先担保其成功。現在決不可能，也無需要說：當初若是採取其他的政策，就一定會勝利的。但顯然，一九二五年在廣州實行的那個服從政策，使工人走錯了方向，而且僅僅把流血的鬥爭延遲到了資產階級更有進攻準備而羣衆完全被自己領袖底政策解除了武裝的時候。一種進攻性的獨立的無產階級政策也可能引到失敗去，那是受許許多多因數所決定的。但這樣一種失敗乃是在衆目昭彰之下的，乃是在反對人所共知共認的敵人時候的失敗，如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失敗一般。其結果將使中國工人幹部更加堅強起來，將使中國工人教育走上新的階段，更明確些，更穩妥些引向中國的一九一七年。但爲了害怕終止「聯合戰線」原故而拋棄獨立的路線，那就是一定要失敗的，而且要付出更貴的代價，要陷工人於沮喪，因爲背後暗算工人的正是人家要工人去信賴的。

七十五年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工人「切不可受民主派底話所欺騙。例如民主派要說，工人如果獨立行動，民主黨就會分裂，因之就會幫助反動得到勝利。這類的話如果拿出來說，最後結果，工人總要上了當的。」（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告德國盟員第一書）這類的話已經說出來了，廣州無產階級終於上當了。（第四章完）

## 新書出版

### 中國革命問題

托洛茨基著  
凡西校譯

新旗叢書之一 春燕出版社印行

實價一萬元

本書包括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之全部論文，書信與談話。起自一九二七年二月，迄於一九四〇年七月。舉凡中國之社會性質，階級關係，政治鬥爭，以及中國之前途等等，均有精詳分析與正確指示。不僅爲一革命的共產主義者所必備，抑且爲留心中國近代史之人士所應讀。譯者爲便利中國讀者起見，對於重要名詞及史實均加有詳細註釋。卷首復附一序文，概括介紹托氏思想特點及其發展。全書共五十萬字。